

资本逻辑视野下人的物质依赖性的当代特征

○ 李娟¹,刘庆丰²

- (1.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福建省委宣传部 理论教育处,福建 福州 350003)

[摘要]当代人仍存在于“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但在当代世界,人们普遍存在于由资本逻辑所开创的宏大的物质生产与交换体系之内,这又赋予了人的存在方式新的特征,即人普遍处于无尽“繁忙”与多重“风险”之中。这些新特征很难在短期内消逝。改善人的生存境遇,不能立足于大脑思辨和道德抱怨,而要从物质生产领域来谋划总体方案。就此而言,用制度来有效掌控资本运行逻辑,以特定“符号”赋予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特殊的“意义”,或许是较为有效的总体性选择。

[关键词]人的存在方式;物质依赖;个性独立;资本逻辑;生活符号

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经济时代,人摆脱了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政治羁绊,开始把自己投向了物质的怀抱,人呈现出物质依赖性。无疑,当今时代,人仍处于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阶段。但这与马克思所指称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境遇中,人的这种生存状态至少呈现出以下两点新特征。而这两点新特征的登场,恰与资本逻辑密切关联。

一、人处于“忙”境之中

“繁忙”的人生。当今时代,在世俗世界中,不论行业、地域、年龄差别,人们似乎总是都处于“忙”的状态中,“我真忙”成了人们倾述心情和解释缺席的最佳话题和最务实理由。“忙”似乎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

从哲学层面看,“忙”意味着:较之以往,人们处理“事情”的数量多、频率高、

作者简介:李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刘庆丰,哲学博士,就职于福建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

难度大、压力重、范围广、时间紧等。“事情”的形而上学涵义在于,它是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这三大关系的方式与路径、过程与结果的总和,它是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表现形态和载体。而在尚未进入物质财富十分丰富的共产主义时代,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基本任务的年代中,人的最大事情就是物质生产,或者可以更一般地说,人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最终归结为物质生产,只不过有的事情直接就是物质生产本身,而有的事情则是为直接的物质生产服务,因而它们也间接地属于物质生产。如此一来,从对象看,人主要“忙”于直接或间接的物质生产,即人在既定的时空内高密度地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耳畔时刻都能听见隆隆的机器声,道路上经常可见的拖着沉重身躯的大吨位汽车,快速穿梭于马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等等,都是人们繁“忙”的另一种注脚。

人的“忙”,实际上还存在心理和精神上的内涵。当人们说出自己很“忙”时,这实际上是人处理事情的主观体验、态度评价和精神状态,它至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积极方面。人因积极完成“事情”而感到生活充实、有意义,正所谓“我忙我快乐”。从而,人正是因为赋予“事情”以积极意义,尽管很“忙”,但却更加乐于“办事”。二是消极评价。一些人因总是被外在的事情包围而感到无奈、悲观和苦恼。这时,“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1]亦即他们话语中的“忙”,实际上就是“烦”,他们试图以言语抱怨的方式来逃脱“烦”,一旦“忙”的强制机制祛除后,他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

资本逻辑与人之“忙”。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援引历史资料指出,据估计在中世纪,人们几乎一年时间中有半年不工作。法定假日一年有 141 天。工作日的急剧延长,乃是工业革命初期,劳动者必须和新引进的机器竞赛的典型特征。对此,阿伦特十分不满,她说:“与‘黑暗时代’相比,我们时代达到的进步程度通常被夸大了。”^[3]这里,阿伦特初步指出了人“繁忙”的物质诱因——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实际上,在资本逻辑盛行的当代世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呈现的更加彻底和清晰。

资本逻辑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不停地驱动着人走向更加“繁忙”。其一,资本逻辑直接强制人们不停地“忙”。马克思一直强调,“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4]可见,资本的主导逻辑和本质规定,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为此,资本就需要不停地撬动生产,因为,任何利润不会从天而降,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劳动生产之中。不仅如此,资本还需要提高生产效率,用时间来征服空间,从而获取更大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为此,资本要求人必须像机器一样,不仅要不停地运转,而且要尽最大可能地加快运转,在压缩的时空内,又好又快地完成生产任务。这样,资本不仅自己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全球,挖掉其他国家工业的民族根基,把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而且它以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巨额的财富为诱

饵,刺激着劳动者也夜以继日地“飞来飞去”,“东奔西突”,忙个不停。概言之,资本逻辑具备不停地自我扩张、自我超越的夙愿和能力,以此,它直接驱动着劳动者不停的、最大效率地生产着。或许正是如此,资本主义才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

其二,资本逻辑洞悉并驾驭人对财富的渴求,间接地驱赶着人们不停地“忙”。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的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给他们,……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和快乐。”^[6]而人们之所以爱好虚荣,是因为尽管由“虚荣”所给人提供的较高地位、荣誉,不是真实的,但不管如何,“享有地位和荣誉的人举世瞩目。人们都急切地想一睹他的风采,并想象(至少是抱同情的态度)他的处境必然在他身上激起的那种高兴和狂喜。他的举动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连一句话一个手势人们也不会全然忽视。在盛大的集会上,他成为他们注视的中心人物;他们似乎把他们全部的激情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以便得到他给予他们的鼓励和启示。”^[7]

现时代,其一,资本全面树立了财富的至尊地位,普遍构建了以物质财富为核心的社会评价机制,如此,不仅资本大鳄们酷爱财富,而且深深蕴藏于普通人内心的财富欲和虚荣心,被全面激活激化,从潜在走向显在。这是人之忙的人本学前提。其二,资本通过影视、广告及其美妙的产品设计,为社会大众搭建了充满诱惑的物质生活愿景,及其似乎就存在于前方不远地方的幻象,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财富欲望和追求财富的实际行动。其三,资本为人们实现自我财富欲求提供了机遇,它简化了社会的阶级存在并逐步消除阶级对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诸多社会阶级构成,逐步简化和明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球化的今天,职工持股计划和高福利制度的实施,无产阶级有被同化的倾向,这无疑又进一步统一了阶级),它大力呼求消除贸易壁垒,并逐步统一了全球市场,建立了各种明晰的贸易规则。在此情势下,它明晰地告诉任何一个社会存在主体,只要愿意致富,那就把自己的所有时间、资源和能量,都投入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大潮中吧。从而,人们“为了取得它(财富),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8]

二、人被抛向“风险”之中

风险无处不在的时代。^[9]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处于安全稳定期。这是对世界的宏观认识,是从战争对整体社会秩序的影响角度得出的。然而,换个角度,相关认识可能就会大不相同。比如,从微观个体领域看,由资本所开创的现代化世界,时刻都处于各种风险和不确定之中,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在现代世界,“本体论差异的等级制度的确定性,被自由的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

所取代。”^[10]这样,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现代人,也便被抛向了风险式生存之境。

其一,从人的实际存在状况看,在宏大的当代世界中,人遭遇多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它们要么来源于自然界(如近些年来频发的地震、海啸、台风、特大暴雨、核电泄露等等),要么来源于社会(如经济危机、金融风暴、诚信缺失、劳资冲突、失业贫困、突发性政治事件等等)。吉登斯把上述风险概括为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而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尔却对人类面临的存在风险,进一步做了如下概括:“不确定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有关食品及其他产品(疯牛病)的跨文化冲突、正在出现的‘风险社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11]

其二,从人对自身存在的感知看,人总是觉得自己就像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根随风飘荡的“芦苇”,内心充满了无限焦虑和不安。人们深刻地体悟到:一方面,就自己眼前的世界来说,它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无限敞开的生疏领域,在此领域内常常会闯入陌生的“他者”——陌生的“人”或从未预料到的“事”,而且,它还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偶然性集中爆发的可能或灾难,“谁也无法保证今天的人,明天会怎样。”^[12]“没有一个人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人间诸事,会朝什么中心方向移动,因此,世间的的生活、可耻地已变成临时的了。”^[13]另一方面,就自己的未来前景来说,它蕴含了多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空间”和“事件”,人们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样,常常为能否顺利实现自己目标而担心、忧愁和预警性反思。对此,本杰明·富兰克林似乎早有体悟,他满怀忧郁地告诉世人:“在这个世界上,除税收和死亡外,没有什么是确切已知的。”^[14]

资本逻辑与社会风险。无疑,人的风险式存在,与人本身相关。作为万事万物中的一种,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不是上帝已经完成了的“作品”,而是在历史 and 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人的生活并不遵循预先设定的过程,而大自然似乎只做完一半就让其上路了,大自然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15]人在“完成”自己“从无到有”的进程中,深受各种因素影响,或者说人是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元函数,每一个因素的稍加变动,都可能为人创生出众多不确定领域和风险。^[16]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7]。所以,要真正理解人的风险式存在,还需要从物质生产角度来进一步解析。资本逻辑是当代全球化生产中的主导逻辑,正是它,才从根本上为人们带来了无尽风险。

上文业已表明,现时代,人的欲望和私利被资本逻辑充分激活。西方有学者指出,无止境追求自己私利和满足自我欲望的个体,被资本逻辑作为创造社会整体财富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全方位地推向“市场”,并“将个体贬低为狂犬乱咬的(市场)竞争主体。”^[18]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大,但它至少表明了人们之间竞争的激烈和无情。如此一来,其一,从个体看,在市场中,人们不是作为生物学意

义上的个体而相遇,而是作为经济利益个体(作为交换价值的主人)而相遇。^[19]为了成功实现交换价值,甚至是为了在更大程度内实现交换价值,在社会这个“暗箱”中,各种匿名化的竞争主体,相互博弈,他们往往会做出令人难以预料交易策略,特别是做出一些非传统道德和法制所允诺的交易,“在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和法权形式的开拓过程中,过去那种只在康庄大道之外的旁沟暗角里搞些冒险的欲求态度,恰恰变成了和规律的经济活动中的支配性的灵魂。”^[20]市场交易个体的冒险欲求及其行为,为交易的另一方开掘了巨大的风险领域。

其二,从社会整体看,一方面,当代世界,“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21]可见,由资本逻辑所创生的世界历史,不仅内含不同层级和区域的生产与交换主体,而且众多交换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更加紧密。如此,当代世界便自然成了一个链条式存在,从而,世界链条上任何一环出现调整或病变,都或许引致整体的动荡与不安,这在经济领域表现的特别明显,“华尔街一打喷嚏,世界就会感冒。”另一方面,尽管资本逻辑使得当代社会正在结合为“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2]但在这个“统一体”内,却交织着诸多复杂性。就思想领域而言,资本逻辑统一一切意识形态的努力不仅难以实现,而且资本的扩张还为这种统一带来了新的困难。比如,就连关于人自身的观念,也变得愈加复杂和混乱。“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的各种特殊学科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23]上述两个方面的综合结果,就使得人存在于内的社会,其风险频率、范围和程度,都十分巨大。

理解资本逻辑所创生的人的风险式存在,还需要提及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一定意义而言,资本是偏爱风险的。因为风险并不总是意味着危险,相反,它有时还代表着可用于获利的空间大,机会多,风险与利润成正比,在此意义上可见,资本本身具备创造风险的主观意愿。可另一方面却是,资本憎恶风险。因为,资本逐利的本性要求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物质交换中,要尽最大努力降低风险、压缩“试错”空间,要尽一切可能,最大化地舍掉各种不确定和杂乱无章的“偶性”,以此种种保证利润的最大化获得。在此意义上可见,人的风险式存在,非资本逻辑主观情愿,“风险社会不是一种可以选择或拒绝的选择。它产生于不考虑其后果的自发性现代化的势不可挡的运动中。”^[24]

上述人之存在当代特征的两个方面,无不彰显了人仍处于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因为,正是由于人对物的依赖性加强,以及个体相对独立性的取得,才使得人可以且愿意“忙”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而恰是因为在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与交换体系中,生产与交换中的各种客观力量、主观力量、客观力量

与主观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范围、程度、频率等各个方面日益强化,人才在总体化的社会面前,感受、遭受了各种无尽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三、人该何为

人的物质依赖性及当代特征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对于人的当代存在方式,特别是对于人的“忙”和人遭遇的各种风险,人们抱怨声不绝于耳,人们痛惜人被物所吞噬,深感人的生活被生产所奴役。但本文认为,不管我们主观态度与情感如何,在短期内,人的物质依赖性及其当代特征还难以根本改变。

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影响人存在现状及其当代特征生成的主导因素——资本逻辑,很难在短期内消失。现时代,资本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一方面,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客观而言,资本仍将继续发挥其“创造文明的逻辑”。这一逻辑的外在成果,就是资本已经和正在制造着一个个“社会进步”的“事实”。^[25]这些“事实”的生成机制在于,资本内在的增值逻辑,使得资本家不停的将剩余价值资本化,扩展着单个资本的体积,不断实现着资本集中与资本积聚的美梦。这进一步壮大了“资本力量”,这种巨大的“资本力量”,发挥着杠杆和润滑剂的功能,到处驱赶着以劳动为核心的生产要素高速运转,进而使得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不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跨越式发展”。这些“进步”事实,构成了资本继续存在依据的内核。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强化其存在合法性,资本的思想代言者们,在辅以极具诱惑力的艺术形式(如电影、广告和食品)之后,便以这些“进步”奇迹为主料,来精心编造关于资本的神话。借助于资本世界扩张体系,资本神话弥漫全球。这一神话的内在力量是:“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26]故而,我们可见,在全球大部分地域内,特别是欠发达区域,资本成了人们信仰对象,成了弥漫于政治精英和市民阶层之中的难以驱散的迷雾。

况且,其二,人存在状况的改善——过渡到自由个性的存在方式,仍然是以资本所撬动的社会物质财富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到了物质财富充分发展的时候,到了劳动不是大众谋生、资本家追求奢侈享受的手段的时候,“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27]换句话说,人在获得自由个性之前,“社会必须首先为其社会成员创造自由的物质前提;在它能够按照自由发展着的个人需要来分配其财富之前,社会必须首先创造财富”,^[28]“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之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9]

如何改善人的存在。为改善人的当代存在方式,有学者强调,^[30]“要恢复对永恒之物的敬畏”、要“捍卫精神价值的至上性”,要“重建人的价值坐标”,要

“归还内心的宁静”。还有学者呼吁,要调和资本与道德的矛盾,特别是要用道德来“引导”、“说服”、“感化”资本,等等。实际上,这些举措似乎都只是一种思想偏好,它们脱离了社会发展的物质根基,无法在实践领域真正实现。举例来看,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世界,繁忙的物质生产,高速的生活节奏,琳琅满目的物质诱惑,内心何以能够宁静?

从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看,改善人类存在方式,我们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努力。

其一,从社会整体上看,社会要有效掌控资本,建立资本承担责任的机制。不管是人的“忙”、“烦”,还是人所遭遇的众多风险,都与资本获利逻辑紧密关联,可见,改善人类存在境况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有效掌控资本逻辑。为此,需要建立资本承担责任的体制机制。

美国学者 W·E·哈拉尔在《新资本主义》中,看到了社会对资本承担责任的呼求。他认为,“以利润为主的资本主义产生于过去的工业时代,当时为满足匮乏时期的基本需要所遇到的困难使物质财富变得特别重要,现在,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变正使更高级的需要处于突出地位……文化规范正在缓慢但肯定地走向新资本主义。”^[31]这表明,社会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后,资本不仅需要把利润作为首要目标,更需要关注社会,树立社会责任目标。进一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资本倘若要良性长久运行,既需要利润逻辑主导,更需要责任逻辑保障,不仅需要生成对劳动的责任,更要生成对“利益攸关者”即社会的责任。

其二,从具体个体上看,人们要找准生活符号,时刻把工作与生活的“意义”放置于心。人类不能没有符号,符号不仅是人表达自我、传递信息的载体,更是人获得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先导,人正是在自己构建的符号及其意义世界中存在着。在此意义上,卡西尔所说的“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是合理的。^[32]进一步来看,凭借特定的符号而赋予“工作与事情”以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忙”就会成为“美”,由风险所带来的“烦”与躁动不安,就会趋于平静。不同劳动职业的人,在不同生产行业工作的人,都有自身的符号,人们只有在各种符号中,才能真正体味到自身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例如,官员喜欢形式化的符号,对于他们来说,大会主席台上的不同位置,从来都是代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一旦坐上了官员们自己所渴求的那个位置,他的内心充满了丰富的喜悦,从而不仅一切繁杂活动所带来的疲惫都消失了,而且一切新的繁忙所需要的动力,也自动自然地生成着。而学者们的意义符号,就是自己的文字、书本,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当自己的文章得到别人的奖赏,那这种埋头的辛苦便会被驱散。总之,在由繁杂的万事万物所组成的世界中,只有自我学会找准带有特殊意义的生活符号,人们的内心世界才是充盈、快乐、宁静的。

注释: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2][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520页。

[3][12]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4、18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

[5][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277页。

[6][7][8]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61、62、62页。

[9] 本文强调当代社会巨大风险性,并非意味着我们否认风险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只要有变化,世界就存在风险,而世界恰一直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从而人也一直处于各种不确定之中,正如《庄子》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我们在此意在说明,比较而言,人类当前生活中所遭遇的风险,其类型、深度、广度都处于一个新的高级阶段,正如有学者所说,“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页注。

[10]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11] 转引自韩震:《关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的沉思》,《哲学研究》2011年第5期。

[13] A·W·李维:《哲学与现代世界》,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14] 詹姆斯等:《美国式民主》,谭君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43页。

[15]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7页。

[16] 人们面临的风险,大致可分为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前者主要是由人们对自然秩序认识的不足而造成的,人们在一个不是自己“制造”的自然界中忍受着恐惧和变幻无常,后者则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造成的,人们在一个深深打上自己烙印的社会中,承受着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面临更多的“自然风险”,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面临更多的则是“社会风险”。就此,下文还将进一步论述。

[18] 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钱敏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19] 进一步说,不仅资本所有者之间相遇是基于他们拥有不同的交换价值,而且,资本与劳动者相遇也是基于此。前者交换价值承担者是以工资形式表现出来的,后者交换价值则是以劳动力形式表现出来的。

[20] 马科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2-13页。

[21][27][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199、56页。

[23] 转引自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24] 沃特·阿赫特贝格:《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25] 在利润目标刺激下,资本天生就崇拜“进步”与“发展”,因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28] 郝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30] 参见何中华:《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1] 转引自黄邦汉:《企业社会责任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页。

[32] 对此,卡西尔论述道:“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责任编辑:嘉 耀]